

## 謝鎮南報答知遇

日本軍閥侵略中國，沒有止境，中國同日本終久必須一戰；希特拉在歐洲擴張領土，咄咄逼人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能避免。故對日抗戰，不是戰不戰的問題，而是時間遲早的問題。

領袖知己知彼，知道甚麼時候對日抗戰，於我們有利；甚麼時候對日抗戰，於我們不利。中日戰爭如果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，則我們損失會比較少些，勝利也來得快些。中日戰爭如果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前，我們的犧牲一定很大，戰爭的時間也會拖得很久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忍耐再忍耐，等待有利的時機。同時國家沒有統一，國內有共產黨作亂，抵消了作戰的力量，在共產黨叛亂未平定以前，也不宜於對外作戰。所以，領袖一再宣示：「攘外必先安內。」這種戰略是萬分正確的，這種國策是不容任何人懷疑的。

可是許多別具心肝，另有目的的人，却利用全國民眾痛恨日本軍閥的心理，高喊對日抗戰，破壞我們的國策和戰略。共產黨喊叫抗戰，是怕我們消滅他們，想借抗日來緩和我們的剿匪工作。所謂民主人士喊叫抗戰，完全受了共產黨利用，替共產黨打邊鼓。軍人想造反，也要藉口抗戰，二十二年李濟深造反，藉口抗日，發動閩變；二十五年陳濟棠造反，要中央領導抗日，發動兩廣事變。

陳濟棠敢於發動兩廣事變，一方面因為和桂系的李宗仁等勾結起來，以爲力量相當大；另一方面，憑恃新建立的一支空軍，覺得足可以用來對付中央。對付二十五年六月的閩變，戴先生策反六十師和六十師反正成功，使其內部瓦解，不經流血而閩變平定。對付二十五年六月的兩廣事變，最有效的辦法，就是釜底抽薪，瓦解這支實力雄厚的空軍。在戴先生策劃之下，陳濟棠的幾十架飛機於七月中旬一齊飛到南昌，陳濟棠像隻放了氣的氣球，一下子癟了。這時候，粵漢鐵路剛修通，中央軍又源源南下，以萬鈞威力壓制廣東，陳濟棠不敢抵抗，宣佈下野，逃往香港。兩廣事變，也沒有流血，就結束了。蓋當時景氣不振，軍械缺乏，而且軍隊士氣低落，人心惶惶，共產黨有聯繫，法西士派禪詔威脅，這些都讓戴先生束手無策。

戴先生大聲疾呼：「敵人是大，禪詔是大，禪詔的軍隊是大，禪詔的社會組織是大。」因他深知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，忙壞我們粵桂籍的同志，真謝鎮南也被戴先生派往香港工作，他是廣東梅縣人，香港有很多關係，可以打入陳濟棠內部，進行瓦解工作。他到香港，祇有兩個多星期，事變就結束了。緊接着，戴先生從南京打電報到香港，要他馬上到廣州，組織臨時警衛組，因爲領袖就要到廣州，衛護領袖的安全比什麼都重要。當時，中國同日本簽訂《塘沽聲明》，中國同日本簽訂《塘沽聲明》。當時，廣州人，第二衛護領袖的安全，責任何等重要，而臨時警衛組又不是一個公開的機構，活動很不方便，萬一有些地方照顧不到，該怎麼辦呢？他靈機一動，還是我一個公開的掩護，活動起來，比較方便些。當時廣州天河飛機場的警衛營營長鄭植民是復興社的同志，他就用這個警衛營來做掩護，向營長借了幾支手槍，每

一大弄到一個符號，在飛機場行動方便，在廣州市也方便。顧同志對此，喜出望外，連連稱贊六個人，點頭說：「陳濟棠下野後，余漢謀任廣州綏靖主任。謝鎮南記得，當領袖的坐機將要抵達廣州上空的時候，到飛機場迎接的人羣，自余漢謀以下中將少將有許多人，再加上許多大小汽車和司機，把整個飛機場弄得亂糟糟地。他們這些無名小卒，看看不成樣子，叫那些司機們把汽車停放整齊，各人坐在各人的車子上。再請那些將軍們排列成隊伍，那些將軍們以為他們是南京來的警衛人員，沒有一個大敢表示異議，立刻排列成很整齊的行列。事隔三十多年，至今回憶起來，餘味猶在。」  
香港有兩個復興社的同志，李新俊和劉蔭甫，當兩廣叛變的時候，同李仁搭上線，居然也高喊抗日，附和兩廣叛變。他們沒有想到，這次事變，形同兒戲，結束的那麼快。李新俊又不敢呆在香港，逃到廣西，依附李宗仁。劉蔭甫自己沒有主張，完全是上了李新俊的當。他覺得過去走錯了路，不能一錯再錯，再跟李新俊跑，於是，回到廣州。他既然違犯了紀律，祇有接受處罰。當時鄭介民先生正在廣州，暫時把他關在黃埔島上。  
（注）臺灣民主黨派：興義會、建業會、正義會。

李新俊和劉蔭甫都是黃埔同學，又都是復興社的同志，如何處理，戴先生也做不了主，必須經過審訊，請報告團領袖批准，才能了結。後來接到南京的命令，要把劉蔭甫解往南京。劉蔭甫有一種特殊本領，他認識草藥，知道那一種草有毒，吃了可以毒死人。他聽說要解往南京，做賊心虛，惶恐起來，以為既然同叛變有關係，其罪不小，越想越怕，越想越想不開，還不如自己解脫了自己，免得將來被處決。就在起解

上船的路上，他採了一些毒草，邊走邊嚼，還沒有走到碼頭，便毒發倒地。起解的人員趕緊把他送往醫院急救，立刻打電話報告鄭介民。就派謝鎮南到黃埔去，料理一切。劉蔭甫中毒太深，已經無法挽救。謝鎮南返回廣州，報告鄭介民。批發了一筆埋葬費，把劉蔭甫埋在黃埔島上。

沒有多久，戴先生來到廣州，好像對劉蔭甫的事很注意，看見謝鎮南，別的不提，先問這件事。謝鎮南把經過情形和鄭介民已經批發埋葬費，埋葬妥當，報告一番。

「不行！」戴先生說：「不管劉蔭甫怎樣不好，違犯了甚麼紀律，他總是我們的同學，團體同志，為團體出過力，流過汗。現在他雖然畏罪自殺，也該當把他好好埋葬。應當給他立一塊碑，不能這樣潦草。」

謝鎮南領到一筆五倍於鄭介民批發的埋葬費，用洋灰把墳墓重新修整，立了一塊「劉蔭甫先生之墓」的石碑，拍了幾張照片，呈送戴先生看過，認為滿意，問題才算解決。戴先生常說：「天理、人情、國法。」因為他把天理和人情擺在國法前面，執法才能無枉無縱，合情合理，而得其中。戴先生最令人懷念的，就是對人極富人情味，即令對於死者，也一樣離不開人情味。謝鎮南對於整修劉蔭甫墳墓一事，每逢想起，還是感動異常。

有兩件很小很小的事情，多少年來，謝鎮南一直記在心裏。當他在廣州擔任臨時警衛組組長的時候，戴先生撥給他一筆經費，要他購買十輛腳踏車，發給警衛組的同志使用。警衛組連他祇有六個人，組裏的

同志們以爲每人一輛，六輛車也儘够用了，不需要買十輛單車。謝鎮南想想，買回十輛單車，不但用不着，還得保管，多麼麻煩，就照組裏同志們的意見，先買了六輛。

「臨時警衛組的腳踏車，你買了幾輛？」戴先生又一次到廣州，這樣問謝鎮南。  
「買了六輛。」謝鎮南毫不遲疑，據實回答。他心想，一定是有人打了小報告，否則，戴先生不會注意這種小事情，大事不問，要問他買了幾輛單車。

「剩下的錢呢？」戴先生又追問一句。

「錢在這裏！」謝鎮南拍拍上衣口袋，直接了當，回答了四個字。

「還是要買够十輛！」戴先生再沒有說甚麼，祇是這樣吩咐他，要他購足十輛。

另外一件故事，是兩年以後的事情。

### 公費不敷另行補貼

從民國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，謝鎮南任廣東站潮汕組組長，公開的職務是廣東省緝私總處潮梅辦事處主任。緝私工作最容易出毛病，所以，謝鎮南待部下很嚴，律己更嚴，以身作則，一絲不苟。地方機構的預算不太充足，辦公活動等等費用，實際上不够開支，每月總是超出預算，多支出六七十元，兩年積累下來，虧空總數就有兩千多元。有一天，他接到戴先生的一份電報：「聽說你虧空很多，究竟如何？希即電

覆。謝鎮南接着又問了幾天。有一天，謝遠辰戴先生和一員軍將：「難道你聽到了？我真聽到了？」答應說兩千元固然不少，但也不算很多。戴先生真是長着千里眼，順風耳嗎？他怎麼又知道了？既然已經知道，也用不着再瞞他。謝鎮南據實皇報，說明預算不够，既不貪污，又要工作，除了虧空，還有甚麼法子？兩千元不算很多，他可以慢慢扣還，不會成甚麼問題。如果戴先生認為他根本不應當虧空，他願意接受任何處分。戴先生覆電，祇是囑咐他不要再繼續虧空，以免貽人口實。

二十七年，戴先生到了香港，要謝鎮南到香港去見他。見了面，沒有說甚麼，開給他一張條子，發特別費五百元。好像是在告訴他，你做了緝私分處主任，不但沒有攢錢，還虧了錢，我雖然不能替你償還虧空，却很同情你，現在送你五百元，總算幫你的忙了。無形中表達出一種濃厚的感情，他心中非常感激。當他到指定地點取錢的時候，大家都在笑，「就是爲了送你五百元，要你跑一趟香港嗎？」其實，他們不明白內情，才會覺得奇怪呢。王文鑑聞一言

經過這兩件事，謝鎮南非常感激戴先生，他覺得戴先生了解他，够得上知己。語云：「士爲知己者死，女爲悅己者容。」他決心在工作上努力，以爲報答。廣州失陷後，負責人李式曾臨陣脫逃，跑到澳門躲藏起來，廣州的工作陷於停頓。戴先生爲重佈置廣州的工作，又飛到香港，找謝鎮南談話，很爲李式曾惋惜。對於廣州方面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去負責，表示焦慮。

謝鎮南認爲報告戴先生知遇的時機到了，毫不遲疑，立刻向戴先生報告：「如果沒有適當的人選，要

我去，我就去廣州恢復工作。」於是潛往廣州，重新建立起廣州的敵區工作。戴先生感人之深，往往種因於極其微小，別人不會注意到的地方。

